



新观察

- 《蟠虺》是作家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发声。
- 《蟠虺》思考的是君子和小人这个古老话题的当代意义。刘醒龙始终坚持着以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不断对知识分子,包括对作家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挖掘,这是一个当代作家可贵的价值立场。

《蟠虺》:重提作家的价值立场

□何 平

文学研究者、批评家和作家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制谜人和猜谜人吗?如果文学作品真的有一个穷极到最后可得的“谜底”,文学批评和研究就简单得多了。猜猜猜,最后不行作家就把谜底亮出来吧。问题是,就算作家的写作是一个制谜的过程,当他完成一部作品的写作,自己可能最后把谜底也弄丢了。因此,很多的时候,对文学作品而言,作家“自己说”也不一定可靠,也不一定说得清道得明。或者,文学的魅力也就在于这晦暗不明和杳然不知所终吧?也正是如此,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结果可能不只是一个,当然通向这些结果的道路自然也不只一条。这些不只一条的道路,在一部作品中,或者平行,或者交叉,或断或续——阅读走通的可能只是一条道路,面对的可能却是一座庞大的迷宫——此说应该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老话了。而且,我以为就普通读者而言,可以径直地“盲人摸象”地按照自己的识力和趣味选择一部作品,什么东西他该用心,什么东西他可以无视和忽略,什么东西他有感,什么东西他无感,毕竟他们不需要像专业研究者那样要对整部作品有一个关涉内外古今的通盘考量。

是的,好的作品应该是向许多方向敞开的。上面我说这么多,是因为读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而想到的。在我的阅读感受中,《蟠虺》就是这样可以向很多方向、很多读者敞开的小说。我们读一部小说为什么不可以只读向我们敞开的那一个“局部”呢?也正因为如此,我读《蟠虺》的时候,一会儿从当代知识人变形记去读,一会儿从当今官场生态的畸变去读,一会儿从盗墓秘史去读,一会儿从盗亦有道文人有情的情爱去读——甚至小说中那些作家貌似没有用心经营,影影绰绰的,大家心知肚明的政治往事以及怪力乱神的灵异鬼怪,在我看来也是小说《蟠虺》的好。这些可以去读的方向,走通了,说白了,其实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个、一个个的小社会——官场、学界和民间等的自足却不乏沟通、勾连、勾结的小世界。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在今天的城市里已经鲜有跨界旅行的多栖人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代人的小说不可能不织一张细细密密的网。《蟠虺》干货多,头绪多,却也疏密有致,张弛得当。这些小社会、小世界和众生芸芸是我们时代的各个具体而微。在《蟠虺》中,首先有着自己的起承转合,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也有着自己的生机——首先各自是生长性的,如水在大地上流淌成河流,然后在恰当的地方又盘旋缠绕成丰富的水系,成为众水流注之处。小说中楚学院和江北监狱就是这样的众水汇流之处,从楚学院和江北监狱可以播撒分散到时代的细枝末节。

和许多出版之日即是湮没之时的小说相比,《蟠虺》是每年可数的那几部,能够一经面世就引起充分关注。批评界和读者的反应都很热烈,在各种书榜和节市中,

《蟠虺》都有不俗的表现。事实上,不只是《蟠虺》,在当下文学的阅读、传播和评介中,名家新作占有着相对充足的批评和传媒资源。批评界和大众传媒很少舍得去发现无名作者的新作——这样,所谓的文学批评“抵达文学现场”俨然成为等待名家下一颗金光闪闪的蛋。必须承认,与普通作者的作品相比,名家之作往往有基本的质量保证,读这些名家新作可以在有限的阅读时间里知道当下中国文学正在发生什么。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去阅读并对这些名家新作下判断。换句话说,名家新作也需要接受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残酷甄别和遴选。但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态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那些针对名家新作的评论,常常是未经深入文本细读,也缺少更广阔文学史参照的时评居多。貌似对作品下了判断,但这种判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就很难说。比如《蟠虺》,目前的评论大致是集中于青铜器和楚文化等等。关于青铜器和楚文化,《蟠虺》确实可以给读者一些考古和文物方面的知识启蒙。我没有调查过《蟠虺》和《盗墓笔记》的读者群有没有交叉。今天读者荒诞不经的考古和文物知识启蒙许多都是来源于“盗墓笔记”式的读物,这些小说的另类知识即使如《蟠虺》的作者做过大量的案头工作,也只是“小说家言”而已。我说的意思是,现在读《蟠虺》,说《蟠虺》好像买椟还珠了,我们好像忘记作家写《蟠虺》除了青铜器、楚文化这些“知识”之外,还别有深意在焉。

也只有读到最后才会意识到《蟠虺》寻宝和夺宝的故事只是小说的一个外壳。寻宝夺宝故事是一个古老的文学原型,其最后的结局往往是邪不胜正。在《蟠虺》,邪与正的边界是“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如果不是君子,青铜器自己会做出选择!”这几乎是解读《蟠虺》的一把钥匙。但和寻宝夺宝的古老原型不同,《蟠虺》是一部当代小说。青铜器厘定的正与邪,外部世界的是非对错,内心的正义与邪恶,刘醒龙是在向他所生活的时代发声。曾侯乙尊盘是失蜡法还是范铸法的学术之争纠缠着曾侯乙尊盘的真伪之辨,而“争”其实是当下官场、学术研究机构 and 民间盗墓高手之间的算计、角力和较量。正与邪时而合流,终会分立。青铜重器为什么可以成为至高无上的终极裁判者——在小说,一方面是历史经验主义,一方面是超验神秘主义。也正是在这里,小说不仅仅可以对历史和现实承诺,也可以向世界神秘的不可知致敬。在这曾经巫风盛行的楚国疆域,《蟠虺》奇诡幽冥。读《蟠虺》,我注意到它神异的部分。那么,刘醒龙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蟠虺》?就是“怪语乱神”吗?简单地说,《蟠虺》是一部有着自己价值立场的小说。《蟠虺》思考的君子和小人这个古楚话题在现时代、在当下如何回应遥远的传统?又以何面目存身“当代”?“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部《蟠虺》,刘醒龙几乎在为追问“君子”和“小人”这两个词的当代意义写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少功曾经发出“楚文化的根哪里去”的诘问。《蟠虺》虽然不是对韩少功诘问的直接回应,却同样在勘探着楚文化的流脉。不仅如此,我认为刘醒龙是在借《蟠虺》的书写对90年代以降的自己作彻底的清洗。作家为文,说穿了,其实要么是向外外部世界扩张,要么是向内心世界挖掘。《蟠虺》是刘醒龙的一部挖掘之作。当然,我不是简单地对刘醒龙在自比小说的曾本之、马跃之、郝嘉、郝文章之清白君子。作家自己的生命中也可以曾经有郑雄的部分,只是现在要作一番切割清洗了。甚至,我私心揣测,如果《蟠虺》不是结束在现在,再往下写,郑雄会不会也像曾本之那样自我否定呢?应该意识到,小说《蟠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有意和故意。我希望在这部小说的传播中,首先确认其文学意义,或者知识分子精神史意义,而不要拘束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联想。从文学意义上看,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的文学正在鼓吹价值悬置、情感零度的“新写实”。而此后不久就是知识分子整体性的精神溃败——这是《蟠虺》开始的时代——郑雄垮塌,郝嘉殒命,小人上升,君子陨落的时代。这是80年代的终结和90年代的开始。而恰恰是这个最需要文学大声说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却“一地鸡毛”。

刘醒龙的文学声誉一部分来自90年代中后期所谓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这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对文学介入现实的期许。现代中国每至社会转型变革时期都习惯要求作家们做出回答,“作家怎么看?”现实问题,文学解决。也正是这时候,刘醒龙的一部小说《分享艰难》被人们误读为分享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福利。及至《圣天门口》面世,我们又再次从“反对”、“对抗”的一面简化刘醒龙对近百年革命的反思,想象中刘醒龙成为自己的叛徒和敌人。文学被我们简化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媾和与对抗,这不是文学的幸福,如果我们现在把《分享艰难》《圣天门口》《蟠虺》放在一个文学系谱上看,有的问题可能会被澄清。这就是80年代末以来,在许多作家矮化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人格的时代,在作家丧失价值立场和精神支援的时代,刘醒龙却在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向上不断丰沛作家的精神资源。现在,通过《蟠虺》的自我清洗可以看清楚其植根于楚文化和五四启蒙时代的底色,可以看清楚他以此为价值立场的文学风貌。无论是《分享艰难》《圣天门口》,还是《蟠虺》都是这种价值立场执守的产物。

行走于哲学与文学之间

——读杨经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 □董外平

就岌岌可危。杨经建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他专门写了《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2011年出版)这本书,论证为什么存在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的文艺思潮。合法性问题解决之后,杨经建才开始着手文学史的研究。但是,从这部书可以看出,杨经建依然感到“合法性”的焦虑,他没有单纯地叙述文学史,而是采用史、论结合的书写方式,其中“论”的部分承担了大量“合法性”的论证工作。

判断某种国外文艺思潮是否存在必须建立在影响和实践的事实上,如果能够证明存在主义影响了中国并被作家广泛吸纳、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20世纪中国的确出现过存在主义文艺思潮。杨经建紧紧把握两个事实逻辑:其一是“西学东渐”的风潮。作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思潮,存在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特色重要思想资源;其二是存在主义思潮与中

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杨经建认为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正是这种精神契合使中国作家容易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

“合法性”的整体逻辑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文学实践层面的事实论证。在这部分,杨经建双面对战,一方面,他描绘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一方面,他又证明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存在主义文学具有合法性。在杨经建看来,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可以划分为六个历史阶段:“五四”新文学运动、早期象征诗派、30年代的新感觉派、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作家群、50-70年代的红色文学、新时期文学。在这六个阶段建立统一、连贯、完整的历史逻辑和内部秩序并非易事,文学的发展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多变,从中拉出一条脉络清晰的线索总是会遇到各种梗节和断裂。杨经建的逻辑推理能力令人称赞,他像一台马力十足的挖土机在杂乱无章的文学地形中打通了一条存在主义

孙颙的坚守与追问

□王雪瑛

妻子,崔海洋和崔丹妮是兄妹,崔海洋和赖一仁是中学同学。崔海洋转业后开公司,成为呼风唤雨的董事长。在“文革”中,他曾对赖一仁陷害摧残,如今,他又动用网络对赖一仁和他的公司开始了新的打击。由于成方滞留香港,突然从崔丹妮的生活中消失,她的人生受到了无可比拟的重创,她原以为自己建立了一种完全由她设计和掌控的生活,却没想到这一切会突然土崩瓦解。

孙颙十分注重刻画小说人物内心困顿后的心理重建。小说中,从小失去父亲的吴语选择以沉默来面对世界,后来在老师赖一仁的培育下,数学成为他与世界对话的语言,软件设计是通往世界的道路。孙颙以此展现他如何从个人的困境中找到通向开阔、通往世界的道路,让我们在历史的负重与幽暗的人性深渊里看到光亮。

此外,小说的结构布局和对历史与现

实的关注都显示了作者宏阔的视野。孙颙在描述现实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忘记历史与现实盘根错节的内在联系。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己人到中年,他们几乎都无法回避同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如何选择当下的生活?小说人物关系和情节推进都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展开的,崔丹妮与崔海洋的兄妹关系,从“文革”时的相互依赖,到如今的道不同不相与谋。崔丹妮学生时代因为哥哥的煽动,对赖一仁进行了粗率的批判,由此两人形成隔阂,如今,崔丹妮主动道歉,两人冰释前嫌。崔丹妮与成方关系的变化,体现了他们各自人生的艰辛与成长的过程。在沙丽与她祖辈的关系中,钩沉出了历史烟云中那辈人的无奈与心灵重负,而这些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无不与时代浪潮的冲刷涤荡休戚相关。

小说《缥缈的峰》中既有社会发展变迁

文学的通道,其中的艰难险阻也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杨经建一定遇到不少像花岗岩一样坚硬的难题,但是本书丰富创见和思想火花的恰恰是那些顽石被凿开之处。

杨经建严谨、深入的逻辑思维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学院派批评,不知从何开始,人们对学院派批评的印象就是学术、刻板、晦涩、无趣。其实,真正的学院派批评并非如此,如果读过耶鲁学派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你就会知道学院派批评是如何的正统、厚重、迷人、深邃。杨经建是典型的学院派批评家,比起花哨的遣词造句,他更擅长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深度的哲学思考,这也许和他多年来潜心阅读德国哲学有关。

同时,杨经建的内心也住着理性的海德格尔和感性的萨特,很多时候,萨特更是占据主导地位。杨经建体验最深刻的也许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存在与虚无”,他之所以花费十年光阴研究存在主义文学,与其自身的精神危机有关,虚无感笼罩在他的精神世界,挥之不去。本真的学术是解决自己与世界的问题,他试图通过存在主义文学研究认识自己的人生处境,同时又把存在主义文学当做知音,分享、化解自己的虚无。因此,《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一书既是学术之书,又是救赎之书。

的宏大历史,也有命运转折变化的个人历史。孙颙在小说中探寻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嬗变、个人命运的变化,笔触是深入而复杂的。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感受这些人仿佛与我同行,读完小说,他们竟然还没有远去,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面临着考验和追问。

过去当然无法改变,现在可以把握和选择吗?将来可以塑造和描绘吗?一场已经过半的人生,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呢?小说被命名为《缥缈的峰》,意味着孙颙从来就没有放弃追问,意味着他从来也没有放弃坚守。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就是人仰望的高度,就是生命不断前行的张力。孙颙以细致有力的笔触描绘着生动的命运流向图,让我看见鲜红的血液回流心脏,时代的大潮冲击着人生的堤岸。每一个人物都不是独行者,他们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一群人物的人生轨迹也是一个时代的踪迹,一群人物的背影也是一个时代的背影。

历史和现实都活在他塑造的人物的生命中,《缥缈的峰》让我们一起回望、反思过去,认识当下的思想资源。

■新作快评 范小青短篇小说《南来北往谁是客》

《收获》2014年第5期

正如胡适先生在《论短篇小说》中所言:“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范小青用文字精心打磨出的短篇小说《南来北往谁是客》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通过一场既匪夷所思又滑稽可笑房屋租赁风波,深刻揭示出现代人内心的孤独以及生活的空虚、荒诞。

小说讲述了一名房屋中介如何协助房东寻找失踪房客的过程:房客失踪——种种猜测——找寻线索——房客出现。乍一看,这仿佛是通过侦探小说惯用的叙事技巧,然而作者却用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完全打破了读者的期待,房东和中介种种不怀好意的猜测因房客的主动现身而变得滑稽无比。预期与结果的巨大落差构成了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反讽与颠覆,从而清晰地折射出现代人内心深处强烈的不安、空虚、惶惑。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现身后的神秘房客一再辩解,自己并非有意拖延房租,而是误认为下个月才是支付租金的时间,而自己之所以长期失联是因为到偏远山区出差,手机没有信号。可是固执的“我”却始终无法相信他就是原来的那位房客。到底是“我”的记忆出现偏差还是其中隐藏着更大的阴谋?直到小说结尾,作者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只留下主人公的一声喟叹:“我想这是一场梦,但却一直没有醒来。或者我并不是在做梦。”浮生如梦,亦真亦幻——这是作者对现代人生存境遇和精神生态的概括,也是对当下整个时代症候的揭露。

值得玩味的还有,作者在揭示当下人们生存状态时所采取的独特的叙事策略。小说总体上是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却在文本中反复呈现“你”的身影。例如,“我”靠清理房间赚钱时,希望“你”不要泄露秘密;“我”被网友骂做“黑中介”时,渴求“你”能给予同情和理解;当“我”发觉回来的房客与原房客不是同一人时,第一时间询问的是:“你”敢相信吗?这种拟书信体的叙事方式给读者带来了亲切的代入感,而在形式上又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间离感。一方面读者会随着“我”的告白而参与到案情的推理之中,另一方面又会因“你”的间歌现身而暂时跳出故事情节,关注到作者有意味的形式搭建。“我”在文中承担着主人公和叙事者的双重身份,读者在倾听故事、参与文本建构的同时,又会在“你”的不断召唤下游离于叙事之外,思索故事情节背后的隐喻与暗示。

此外,这种将仿真性与间离感融为一体的叙事策略还给读者带来了双时态并置的阅读体验,即小说的故事时间处于过去完成时,而叙事时间却时时刻刻在现在进行时,就仿佛是“我”正在为“你”讲述一场无法醒来的梦。这场梦梦的每一个细节都如生活本身一样真实可感,但整体上又是如此荒诞不经。

■评论

自古以来,文学与哲学常常紧密相连,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具备哲学的深度,形而上的哲学常常以文学为载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萨特、加缪、波伏娃直接将存在主义哲学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并且形成一种以哲学命名的“存在主义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存在主义文学既是文学的也是哲学的,在存在主义文学中,文学与哲学融为一体,为跨文学与哲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存在主义文学”概念的合法性无需再论证,问题的核心是“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合法性。“存在主义”与“文学”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关联才能被称为“存在主义文学”,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作品毫无疑问是存在主义文学,但那些未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却具有某些存在主义内涵的作品算不算呢?这是杨经建的论著《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一开始就面对的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研究的合法性

孙颙的小说《缥缈的峰》中有写实的具象,有写意的内涵,还有灵动的留白、深远的意境,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小说始于新世纪初加拿大银色的茫茫雪原,主人公成方和沙丽已经人到中年,都想回国探望,成方想回到已经离开25年的家园,沙丽是要完成祖辈的心愿。成方为什么会仓促离家去国,孤身在外多年?他将如何回到祖国?25年过去了,家园和家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变,他又将如何接受这一切?沙丽的祖辈到底有怎样的心愿等着她去完成?小说开篇布下了大量线索和悬念,同时也打开了一个宏阔的时空场域,境内与境外、历史与现实、个人与家国的命运在小说中交汇。

成方是串联整个小说的核心人物,他为逃离崔海洋布置的黑幕交易和崔丹妮的婚姻枷锁而滞留香港,而后流落海外,艰难谋生。他在海外的动荡生活中找到了自己情感的归宿——沙丽。因为沙丽的意外受伤,成方只身回国,帮助沙丽实现她祖辈的愿望,处理她的祖父在国内遗留的房产,实现他们捐赠支持教育的心愿。小说的第二部分主要讲述崔海洋、崔丹妮和赖一仁三人在国内的生活,崔丹妮是成方在国内的